

I207.4 小说研究

《花溪》创作辅导丛书



· 刘心武
· 刘绍祺
· 汪曾祺
· 从维熙
· 胡万春
· 叶辛
· 林凯光
· 陈国坚
· 何士光
· 王蒙
· 王愿坚
· 周克芹

小说创作十二谈

XIAOSHUO
CHUANGZUO
SHIERTAN

卷之十二

小端世圖十二

卷之十二

小说创作十二谈

《花溪》创作辅导丛书之一



一九八三年四月

贵阳

目 录

- 序 赛先艾 (1)
绕 刘心武 (7)
开拓 刘绍棠 (13)
“揉面” 汪曾祺 (20)
——谈语言与运用
觅 从维熙 (37)
——谈细节
捕捉 胡万春 (41)
——谈人物肖像描写
感情与色彩 叶 辛 (51)
取舍 林斤澜 (59)
入微 陈国凯 (70)
——观察生活琐谈
选择 何士光 (78)
翻与变 王 蒙 (86)
凝练 王愿坚 (95)
说“竭” 周克芹 (106)

序

塞 先 艾

在一九八二年一年里，贵阳市《花溪》月刊为了给有志写作的青年同志们一些帮助，约请了当前我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十二位老、中、青作家，根据他们的创作经验写些文章，基本上谈的都是小说技巧问题（也有一部分涉及生活的道路），每人一篇，专栏叫《小说创作十二谈》；发表以后，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把它们汇集成册，这样就更可以嘉惠士林，扩大影响。编辑部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介绍。我虽然写作多年，迄无成就，同样需要向这些作家学习。我想在这里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我觉得这十二篇文章写得有一定的分量，言之有物，都是从作家们长期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西南地区的三位作者中，和我最熟的是何士光和叶辛（何讲了小说的内容、技巧、样式的选择；叶讲的是一篇作品要注

入真挚的感情，才会富有色彩）。周克芹同志，我只读过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那是一部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长篇佳作，周扬和沙汀同志曾经推荐过；最近已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他在《十二谈》中的文章，强调了不断积累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生活枯竭了，“江郎”固然才尽，技巧也会成问题。汪曾祺同志，应当说是一位老作家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就在郑振铎和李健吾同志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读过他早期的作品。他是沈从文同志的学生，文风似乎也受到了老师的一些影响，善于描绘人物，用写散文的手法来写他最熟悉的过去江苏高邮一带人民的生活。我很喜欢他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写的两个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他说，他写小说总是打好腹稿，想透了才写，宁可重写，不习惯在原稿上涂改。鲁迅先生当年就教导过我们，要“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所以他自己的小说写成后，修改不多。汪曾祺与沈从文是有所异趣的；从文写小说很认真，经常在手稿上或增或删，不厌其烦，反复修改。作家写作的方法和速度，各有“个性”，有的倚马可待；有的人惨淡经营，精雕细琢，都应当受到尊重。我认为深思与细改并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汪曾祺还说，“语言要与人物贴近”（他举了

《史记》和《聊斋》上的例子），他所指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性格的语言（对话），这是小说家描写人物的方法之一，采用了比较生动、凝练、准确、适合人物身分的语言，就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小说中人物的形象。

从维熙同志谈了小说的细节问题，事关重要。如果一篇小说缺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就会黯然无光，空洞无物，人物也就根本站不起来。我忘了是哪一位作家说过，故事易觅，零件难寻，所谓零件，就是细节。契诃夫、鲁迅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把人物的细节、特征简要地勾上几笔，就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典型。陈国凯同志的《入微》，着重谈了如何观察生活，把它同从维熙的《觅》合起来看，对我们确有启发。

胡万春同志的《捕捉》，讲了人物描写。一个作家在深入生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仔细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他们的外貌、性格、言谈举止、习惯，直到公私生活、内心世界，都不能轻易放过，要经过熟悉、思考、研究分析，才能把人物和事件概括集中起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也可以用一个人作模特儿来提炼、加工、增补。在今天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变的新时代，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

么，我们在小说中，就更要着力塑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创业精神的先进人物形象，用以教育人民；或者使广大人民在欣赏美好的艺术中受到潜移默化。如果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斗争去描写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和美好心灵，只是平铺直叙地、静止地去叙述，作品是不会生动感人的。一个作家杰出的小说，肯定来源于生活，但是，对古今中外的名著也必须有所借鉴或者批判地继承，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为什么有些作品虽然轰动一时，而时过境迁，读者就把它们束之高阁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刘心武、王蒙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写小说不能总是走老路，必须克服平庸和一般化，那就是说，要创新，要突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当敢于对创作进行新的探索；但是也得从作家的实际生活出发，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就要熟悉了以后再写，否则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

王愿坚同志的《凝练》是一篇切中时弊之作。五十年代，我曾经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党费》，他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小说可以说是短小精悍。具体地说，就是主题鲜明，人物生动，文字简练，没有繁琐的回忆或者不必要的过程的描写。建国以来，我们有些短篇小说的思想

内容、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的确超过了前人；但是也有一些短篇小说，动辄就是一两万字，两三万字，往往伤于冗长，接近中篇小说的压缩。茅盾同志生前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这个缺点，（孙犁同志好象也谈过）；但是作家和编辑都不大注意，看来，好象有点积重难返了。

林斤澜同志的文章，谈到小说构思的取舍决定于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只有在对生活的积累和理解中才能找到。他举鲁迅的《孔乙己》为例，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核心是忠厚、老实。鲁迅的小说就是围绕着这一点来写，在构思上作去取的。斤澜的文章，给我们解决了“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比较精炼”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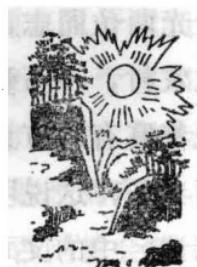
刘绍棠与何士光两位同志，都是以乡土文学名世的，一写河北农村，一写贵州农村，他们长期扎根乡下，小说都富有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刘绍棠写的中篇相当多，这说明了他的生活广度。他们在《十二谈》中的文章，也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我建议读者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进一步去读这十二位作家的代表作，因为他们写作的技巧具体表现在他们的小说上。要想有所借鉴，就必须看他们的作品。这本书谈小说技巧，自然还不能说已很全面，不过主要的问题都谈到了。最后，

我要说一下，写好小说，深入生活、博览群书是很重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作家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这才是根本；根本问题解决得好，其他问题（包括技巧）经过刻苦努力也就会解决得更好。

1982年12月于贵阳

尾花 土 一



绕

刘心武

《花溪》要搞“小说创作十二谈”，每月一篇，让我来写第一篇。我哪里懂得什么小说技巧？不过我是“作茧自缚”，只好硬着头皮来写。此话怎讲？后面再点明。

我觉得，写小说下笔要立足于一个“绕”字。怎么个绕法？别人写过的，你一定要绕过去。不然就会雷同。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你也一定要绕过去，不然读者就会起腻。下笔的时候，你要时时想着读者，读者不想看的、已经熟知的、能够猜出来的，你都要绕过去。

两点之间，直线为最短；从甲地到乙地，最好选择最捷路径前往。然而短直和便捷，对于写小说来说却绝非最佳手法。读者读小说，不同于读几何定理和交通指南，他总希望从中获得些意外的启发和探究的乐趣，当然还有美感方面的满足。打个比方，读小说好比逛公园，既然从前门

进去了，当然并不急于从后门出去，更不喜欢进了前门便望见后门，最好是或曲径通幽，或柳暗花明，既能登高望远，也能临池低照，如能回环借景、七通八达，则更觉快意无穷。总之，除了特殊人物特殊原因，游客逛公园的路线必是绕来绕去的。绕既是游客的心理需要，那么布置公园的人则一定要尽量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给游客提供充分的绕的乐趣。曹雪芹是写小说的高手，你看他写“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段，大观园的种种景色，他当然早已设计停当，甚而至于案头都有一张为写小说而画就的大观园全图。然而他写贾政带人进得园去，却并不安排他们顺园内主道顺序游览，而是偏从小道入内，绕来绕去；整个大观园的情况，这一回也并不说尽，后面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加以补充，最后才把大观园的全貌，绘于读者心中，真可谓善绕也！这一回里他写贾宝玉才思敏捷，每题一匾一对，描写的方法也变换不板。你以为他处处都要把宝玉突出，他却偏有一两回让清客所吟出的对子，也颇可取之处，而宝玉也不再讥笑替代；写贾政对宝玉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贬斥，偶尔也还有暗喜的反应。这也是绕。就是不但在大处使读者出乎意料，在小处也使读者顿感灵动活泼。写贾宝玉、蒋玉菡、冯紫英、薛蟠和妓女云儿喝酒行令唱曲

一节，在使薛蟠出够了丑的时候，忽然让他说出一句极雅极文的词句。这又是绕。其效果，是愈发使我们感到薛蟠真是一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的呆霸王！中外古今的经典小说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它们互不雷同，各具风味。仔细琢磨，不甘直来直去而善于绕来绕去，实在是写小说的一种基本技巧。

我很怕有的文学青年听了我这话，简单化地以为绕就是“卖关子”，就是设置悬念。悬念固然是一种绕，然而我所谈的绕，包含的内容比这宽泛得多。在立意上就应当绕，这绕不是说立意要古怪或晦涩，而是说应当出新并力求深刻。我自己近几年学着写小说，处在很幼稚的状态，本不配谈技巧，更不配举自己的小说为例。然而考虑到这类文章主要是文学青年们读，他们实在是希望我这类发表了一点小说的人能结合自己的创作来谈，从而显得亲切活泼一点，所以我也就不揣浅陋，举一点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说明问题。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宋宝琦一类的畸形儿是“四人帮”造成的，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便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

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的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挽救小流氓的正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后面所写，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读者从作者的绕中得到了一点启发和满足，因而愿意支持和欢迎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绕，不仅是个情节安排的问题，而首先是个绕过陈旧的主题、雷同的立意、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不嚼别人嚼过的馍，力图从生活出发，去出新制胜。

再强调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绕，不是关在屋子里挖空心思地瞎编，似乎越曲折越离奇，甚至于越怪诞越出格，便越成功。你一定要从生活出发，要追求艺术的真实，要力图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顾及到内容和形式的合谐，要美。正如不是每一所可以绕来绕去的公园都那么可爱一样，并不是每一篇绕来绕去的小说都必定有较高价值。绕，要有正确的立场，要出于健康的美学趣味，要符合逻辑，要遵守文学创作的一系列规范，而归根结蒂要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服务。为绕而绕，便成了小孩子捉

迷藏，属于文字游戏而非文学创作了。

有的文学青年可能会问：难道开门见山、白描式的写法，就不足取吗？这倒不然。大凡当绕来绕去的写法蜂起，而且不少作品绕得过分，令读者厌烦之时，一种返璞归真的开门见山、白描式的写法反会令人眼目一新。这其实也是一种绕，就是绕过那些绕得花梢的作品，好比在峰回路转、花木交错的公园中，忽然安排出一泓清亮的湖水或一片开阔的草坪，常能反而以单纯到一目了然的地步而产生魅力。据说国外文学的发展，在出现了包括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等以形式上绕得出奇的文学流派的汹涌浪潮之后，现在反倒有不少作家，采取一种接近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小说。从外在形式上看，不但平铺直叙，甚而交代多于描写。而这样的作品，影响反倒又大了起来。我想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前些时一位文学青年来找我，苦恼地说：“我的作品上不去，看来主要是意识流流不起来！”我问他：“你为什么非得要意识流流起来呢？”他高声抗辩说：“现在不是时兴这种时空交错的意识流写法吗？这种写法不正是你所谈的绕的写法吗？我绕不上去不该着急吗？”我告诉他：既然现在时空交错的意识流式写法已不新鲜了，你又何必非去凑热闹呢？我所说的绕，绝不是仅仅指形

式上的东西，最最要紧的，是绕过别人已经写过、用过、试过的东西，去开辟自己的新路！

当然，篇篇从内容和形式上完全绕过别人和自己已经发过的作品，一般人的确难以做到，也不必这样苛求自己；但每写一篇新作，总该至少在一个方面，或立意上，或人物形象上，或结构上，或细节上，或语言上……是明显绕过了别人和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吧，否则，不只能算是模仿和重复吗？

写文章如此，办刊物也是如此，要避免“英雄所见略同”，才有吸引力。《花溪》的同志来北京约稿，出的题目本是“我写第一篇作品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知道类似的栏目已有《文艺报》等五家刊物用过或正拟采用，而组稿对象也大同小异。这样不但作者为难，读者将来也难免腻烦，何不另辟新栏目，如“小说技巧十二谈”，一年约十二位作家撰稿，岂不有趣？他们当即采纳了我的建议，但同时也宣布：“你来写头一篇！”我本想把他们的约稿绕过去，没想到却被他们当场抓住脱不了身，没办法，只好勉为其难写成此篇。好在后面的十一位作家的技巧谈有真货在，读者恕我浅薄，且绕过这一篇，等着往下看吧！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写于北京沙板庄

开 拓

刘 绍 楠

1

经历了二十二年漫长岁月的坎坷，我虽然秉性难移，但是也有不小的变化。五十年代，我常想到的是自己在哪些方面胜过别人；现在，我却是常想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如别人。

我和目前活跃于文坛的五十年代的伙伴们逐个进行比较，发现他们各自都具有我所不具备的长处，这就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而要想弥补我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缺陷，已不大可能。因为，我的局限性的铸定，是和多年来的生括经历、学识教养、艺术造诣、性格气质所分不开的。因而，我在创作上，只有避人之长；而避人之长也正是避己之短。

看到了别人的长处，认识了自己的短处，也就发现了自己；发现自己有所能和有所不能，创